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身体政治

丁林棚

内容提要: 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用文学的想象和叙事阐释了权力的无孔不入,权力政治的运作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主体都被它俘获。小说中身体被呈现为书写的对象,也是权力、意识形态、宗教等因素的作用对象。对身体的书写体现为对制服的符号语义学应用,通过服装将社会等级进行可视化分类与限定,使得基于视觉的对身体的驯服得到强有力执行。小说还呼应了福柯的身体权力力学机制,权力对身体的控制需要符合严格的物理学和力学原则,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功用目的。小说中最为极端的权力形式方式就是对人口的控制、淘汰、管理和社会等级分层。本文结合福柯有关权力的理论探讨了阿特伍德小说的权力描写,以此阐释作者的权力观。

关键词: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 政治 权力 凝视 身体

中图分类号: I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7)01-0000-0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拿大文学的民族性构建研究”(11BWW031)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北京 100871

Title: Body Politics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Abstract: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is an imaginary futuristic world under the ubiquitous rule of power. Power politics shrouds the entire world in a sepulchral atmosphere in which the operation of power is apocalyptic and yet inevitable. The human body serves as the primary site of conflict, often taken prisoner by the unstoppable necessity of soc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theocratic power structures. The human body is manipulated as a sit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unctional inscription. The means of writing the body are implemented even by stringent principles of Foucaultian "mechanics of power".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describes the dystopian world as one permeated by biopolitics, namely, population control, social management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name of pow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novel in connection with Foucault's social theory and aims to elucidate Atwood's own stance on power politics.

Keywords: Margaret Atwood, *The Handmaid's Tale*, written body, politics, mechanics of power, biopolitics

Author: Ding Linpeng, Associate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dinglinpeng@pku.edu.cn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被广泛奉为女性主义经典。在小说中,作者对女性的命运表示强烈关注,并对政治、权力与个体状况的关系做出了深刻思索。阿特伍德尤其对权力对身体的压制保持强烈兴趣。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极权宗教社会,当权者无时无刻不在对身体进行残害和压制。身体不但成为暴力的承受对象,而且充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擂台,成为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也成为社会话语控制、微观权力和规训机制运作的载体。本文结合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相关理论探讨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审视生产驯服身体的机制和手段,并阐释政治和权力运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及对身体的控制。

被书写的身体

法国哲学家福柯一向关心权力的运作机制,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身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任务,执行仪式,发出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运作,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规训》27)。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只是肉体的承载媒介,而且成为政治和法律约束、技术管理等现代权力机制的客体。根据福柯的关于身体和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观,身体在实质上就是文本,因为身体首先是通过各种话语的约束而产生的,必须服从制约性标准和特定的符号体系。人的身体是社会话语的“羊皮纸”,上面镌刻了不同的话语痕迹、归驯手段和惩罚机制。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身体,是“事件进行书写的表面”(“Nietzsche”84)。

阿特伍德关于身体的思想和福柯有很大的共性,她也把身体描写成载有各种力量运作痕迹的文本,也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微观运行机制。戴维斯(Madeleine Davies)在关于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其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是各种焦虑的战场,这些焦虑和各种权力结构息息相关,都被写入了女性肉体”(58)。的确,在小说《女预言师》(*Lady Oracle*)中,身材臃肿的女主人公琼发现“我的身体就是有争端的领土”(69),变成多重欲望和权力的对象,既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又是后殖民身份的试验场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宿主。她的本姓德拉克尔特源自法国贵族姓氏,但母亲却给她取了个美国好莱坞影星的名字“克莱福德·琼”,这体现出魁北克法裔文化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及大众消费文化价值的冲突。母亲按照美国大众审美价值严格控制女儿的饮食,希望她做一名舞蹈演员,但琼却“顽固地不停进食,能吃什么吃什么”(73)。琼在餐厅里的意大利移民同事强硬地“要求你嫁给我”,并表示他们的文化隔阂不成问题:“你会改变的”(96)。琼的身体无疑象征着加拿大在面对多元移民文化时的后殖民身份困境。

身体不仅是束缚个体自由的工具,而且是国家、政权、宗教、意识形态等政治权力操控的对象,其上刻写了不折不扣的身体政治。“被书写的身体”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的社会中得到了完美执行。在这个神权社会中,身体被镌刻上各种印记,并按照不同功能(如性别、生育能力、年龄、职业等)分门别类进行管理。比如,叙事者奥夫弗雷德(Offred)的身体对司令官弗雷德(Fred)来说就仿佛是“一个他能够读懂的有关所有权的布莱叶盲文”(254)。身体如同画布,种种欲望、话语、规则纵横交错。使女的身体属于社会财产,只有

司令官才拥有限定的使用权。奥夫弗雷德的身体“被作为一种工具所利用”，是各种力量交汇冲突的“地盘”、是“暗藏着各种危险的所在”。不仅如此，小说中男性的身体也都“必须经过检查与比较”，仿佛身体是随时编辑和修改中的文本。所有身体都被作为“一种标记”，用以辅助神权政权维持其“一切井然有序”的话语机制(73)。奥夫弗雷德把自己的皮肤想象成一张地图，这种身体的图绘显然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她的身体成为权力体制的表征符号，而非个人的肉体，她觉得这是“一张表示失败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没有尽头的小路”(143)。

对身体的书写意味着对身体的文化和权力统治，这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政权对身体采取的各种暴力惩罚手段如纹身、烙印、伤痕等，它们使身体成为政治权力和法律戒令的书写介质。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书写是一个充满压迫和被压迫的权力斗争过程。身体并非单一的肉体存在，而是“被话语(discourse)建构成了‘真正’的身体”(Silverman 32)。实际上，身体的一切过程，包括性别、功能、姿势等都是由社会和文化话语所制约的，“在话语中存在的身体的意义决定了身体的物质属性”(Dallery 59)。对身体的惩罚性标记俯拾皆是，例如奥夫弗雷德在惩戒墙上看到两具尸体，上面用红色标记出一个大写字母J，她虽然知道“这个字母并不代表犹太人(Jewish)”，但除此之外她“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200)。奥夫弗雷德作为底层的使女不能读懂被书写的身体，她们象征性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体，更没有解读身体的权力，这是对主体规训的绝对化表现。在小说中，所有人的身体不再为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公共财产。使女们发挥“会行走的子宫”的角色，而男人们“也是性机器，除此之外什么也算不上”(144)，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执行神权政府繁衍人口的政策。在定期的授精仪式上，就连居于社会上层的信仰司令官也心不在焉，“游离于身体之外”(160)。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19世纪以来，身体暴力逐渐温和，演变为囚禁、集中营、劳教等形式，以生产“温顺的身体”(Discipline 135)。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也强调了身体的非暴力书写，她尤其强调对身体的文本标志和符号管理，例如对制服和时装的使用。作者精心想象了一个极权社会，在这里，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通过制服对身体进行象征书写，使身体成为符号语义学构建的产物。小说中每个社会阶层、每种职业都有特定的制服，用不同的颜色、图案和款式代表其地位和职能。正如文化研究哲学家史文德森(Lars Svedsen)所说，“极权社会中存在一种趋势是，所有公民必须身着制服”，这样权力就得到彻底的可视化执行(34)。在《使女的故事》中，通过制服的颜色分类，身份政治和阶级分类被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这样权力话语就在身体上被可视化了。比如，司令官阶层一律身着代表权威的黑服，连伞和轿车都是黑色。在“挽救仪式”上，挽救者也身穿黑袍，头戴黑帽，执行生死大权。身着绿制服的信仰卫兵们负责“维持日常秩序并执行其它勤务”(20)，因为绿色象征社会职能角色。女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司令官夫人阶层身穿蓝色，如同服务工一般。根据基列共和国的身体符号学法令，信仰司令和夫人的女儿在婚前必须穿白衣、蒙白纱，以示和其它女人的区别。负责监管使女的嬷嬷们则身着棕色，她们是唯一拥有读书权力的女人。作为底层男人的配偶，经济太太们负责所有护理和生育智能，因此她们的着装包括红、蓝、绿多种，以显示其多重角色。显然，基列共和国的政权针对身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基于不同颜色的符号学的身体书写机制，这是对身体的话语书写和定义，用

颜色的象征意义对身体和主体加以限定,通过可视化的操作对身体进行文化语义学标记,是比中世纪身体暴力更温和的一种规训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阿特伍德小说中身体、服装和权力的深层社会意义和文化符号学内涵,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不过,库恩(Cynthia G. Kuhn)在她的专著中对此做出了探索,她认为阿特伍德让“身体充当了灵魂的外衣,用这一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框架来显示主体性、表征、声音、性别和文化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144)。阿特伍德小说同样关注和制服相对的时装所发挥的文化作用。格罗尔斯认为,时装是“反乌托邦的(anti-utopian),也是反极权的”(qtd. in Svendsen 34),因而在小说中是被绝对禁止的。小说中所有代表自由和选择的服装全部成为违禁品,“所有石灰绿、红色、紫色的丝绸、尼龙和假冒的毛皮、黑色绸缎、金色的线织物、比基尼短裤、透明胸罩”等都被扔进大火焚毁(230),电视镜头中还有生产商和进口商因为进行违禁时装贸易而被示众,他们“头顶尖帽,上面用红字写着‘耻辱’两字”(230)。显然,在小说中服装是权力的外衣,它起到了对身体进行约束和定位的作用,使得权力可视化。服装与囚禁这一社会隔离手段不同,因为制服在围墙之外用可见的形式将穿制服的人与他人隔绝,这种无形的隔离显然依赖于对身体高效的符号书写和划分。这样空间监禁的传统惩罚模式就被不知不觉地隐藏起来,用可视化的身体规范和分类模式取代了空间约束,用统一的外在标准化审美价值取代了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模式”(Panopticon)。

身体的权力力学机制

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传统思想中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灵魂重于肉体,而肉体被视为可以随时抛弃的累赘。但是现代社会中,身体逐渐成为身份的展台。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身体已经取代灵魂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和角色”(130)。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和身份在等级制度下得到了完美的掌控,还发展了一套和身体规训相配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用以约束所有人的日常起居和行为。控制身体和控制灵魂一样重要,基列共和国的日常事务就是规训身体。身体被确立为一种需要特别关注的东西,被理解成为一种可塑性很强的、需不断加以改变以使之适应新规范的东西。福柯指出,人类自古典时代起就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Discipline 136),身体与技术的政治学的结合使统治者可以塑造“驯顺的肉体”(135)。当代人类的知识与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性的“身体科技”,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规训控制不仅仅在于对身体的限制,而且在于对身体“执行细微的胁迫,甚至到了机械的水平,包括身体的运动、姿势、态度和速度”(137)。权力的执行形式表现为一种有效率的“作用于身体之上的威吓式政策”(138)。福柯把这种对身体的规训称为“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或“权力的力学机制”(mechanics of power),^①它可以使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控身体。

^①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 mechanics of power 这个概念,强调权力在规训身体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速度、节奏、姿态、角度等,把权力对人体的“微分权力”和物理学及力学原则相联系,同时又服务于政治目的,实现权力对身体的经济功力要求。刘北成等的中译本把 mechanics of power 翻译为“权力力学”,把 microphysics 翻译为“微观物理学”。鉴于权力的政治和物理双重属性,本文采用“力学机制”这样的表述。

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权力的力学机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执行。神权政权对身体姿势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场合配合不同的体姿,不同的体姿则体现不同的教育和规劝目的。纪律规定了肉体与其操纵的对象之间的每一种关系,这种“权力的力学机制”首先和建筑的“功能场所”角色相结合(*Discipline* 143)。例如,信仰司令官的“坐落室”(Sitting Room)完美贯彻了纪律的空间分配艺术。这里本属于实用的多功能空间,“本来应该叫画室,后来却叫起居室,再后来叫休息室,或许它就是间画廊,里面到处是蜘蛛和苍蝇。但现在它的官方名字是坐落室。”坐落室的功能按其字面意义被严格限定:“这间屋子确实是让人坐的。当然是对某些人而言。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有站立的空间。此时此地,站姿至关重要,因为肉体上的细微不适能起到教诲的作用”(Atwood, *Handmaid's Tale* 79)。显然,纪律空间和身体规训被职能化了,这种建筑学的“权力力学机制”体现了福柯所说的“功能场所原则”(functional-sites principle),也就是“对一个规训场所按照多种不同的用途进行构造”的原则(*Discipline* 143)。建筑空间的构造既能够保证了身体权力的实施,又具有等级空间的实际功用,“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事件和姿态的更佳使用”(167)。在起居室里,奥夫弗雷德幻想自己能够随意摆布室内的小玩意儿,这样就可以让她“有一种权力拥有感”,但她发现这“充其量只是想入非非,而且过于冒险”。她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大腿并拢,脚后跟折起垫在臀下,挺直身体,低着头……”(81)这种姿势被规定为日常规范,使女们必须学会永远遵守对身体各部位姿势的限定,成为福柯所说的“习惯的自动体(automatism of habit)”(*Discipline* 135),最终把身体转变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傀儡或者小规模的权利模型”(136)。这种对身体姿势的规范化裁决是基列共和国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的一部分,充分展现出福柯所说的“政治解剖学”原则。身体一旦成为“习惯的自动体”,就会丧失支配权,因而使女们感到和自己身体隔离开来,身体成为陌生的外物而使主体本身无能为力。奥夫弗雷德发现,“仅仅是取下沉重的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仅仅是用手触一下自己的头发,就是一种难得的奢想”(62)。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

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裸身感到陌生。我的身体似乎已陈旧过时。我真的曾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呆过吗?千真万确,毫无顾忌,就在男人们中间,一点也不在意我的两腿、双臂、大腿和后背袒露无遗,完全暴露在众目之下。……我避免往下看自己的身体,并非因为觉得它不知羞耻或厚颜下作,而是因为我不想看。我不想看如此完全彻底地影响决定我自身的东西。(63)

的确,在福柯的规训控制中,身体完全丧失了自由,必须和权力相一致,必须建立“身体和某种态度的最佳联系”。“习惯自动体”的培养实际上就是规训身体的时间性,而对身体的“正确”使用就意味着对时间的正确使用。换句话说,身体的节奏和速度都必须符合权力的严格规范,一个“温顺的身体是一种有效的姿势的前提”(*Discipline* 152)。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写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身体作为“习惯的自动体”完全没有了主体自由,时间对身体速度和节奏的约束十分严苛。作者对“授精仪式”中司令官的动作描写充满了反讽。司令官趴在乔伊身上,“用四二拍的进行曲速度动作着,象滴水不断的水

笼头”，但“既没有快感，也没有痛苦”（94）。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对身体的管制和驯服甚至具体到对活动的掌控，它要求身体必须能够建立一种规律、一种节奏，并且能够“调节重复的周期”（*Discipline* 149），并要求身体能够达到一种“精准的程度”，从而“按照时间指令（temporal imperatives）来调整身体”（151）。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的一切行为和动作都必须符合规范化要求，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人口繁殖的各项规定。使女们每个月“诚惶诚恐地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因为一旦来了，那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没能够达到他者的期望”（73）。这或许是对福柯所说的那种“行为的解剖—时间性模式”（anatomo-chronological schema of behaviour）的极端化执行（*Discipline* 152）。身体的生理性规律必须和社会的节律性模式相一致，否则就意味着个体的失败。不过，奥夫弗雷德能够通过保持对身体的幻想做出反抗，她想象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片暗藏危险的土地，是我自己的领土”。她努力保持自己的记忆，希望不忘记对自己身体的主权。每当夜晚，她就会“陷入到我的身体内部，就像陷入到一块沼泽地或湿地，而只有我才知道在哪里落脚”。她回想到了以前，此时的她能够“把我的身体当作一个带来快乐的工具、一种交通方式，或是实现我自己意志的执行工具”（73）。

身体的生命政治学

福柯在研究人类历史权力的运作基础之上，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生命权力”（biopower）的概念。根据他的理论，生命权力具有两种形式：它首先对身体进行规训，把身体视作机器，这种权力在军队、教育、劳动等场所广泛存在；其次，生命权力旨在控制人类的繁殖能力，在人口控制、人口分布学以及人口统计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History* 139）。和身体的“政治解剖学”相对应，“生命权力”关注“公共卫生、对出生率和死亡率比例的调节等”（“Meshes” 161）。这种生命权力在小说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当局政权对身体进行规训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生育和繁殖，因为“出生缺陷率已经达到了35%”（121）。基列共和国对“人口的干预成为社会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以力求围绕人口建立其某种机制，保证人口的驯服和他们的可用性”（Foucault, *Power/Knowledge* 203）。不过，小说中神权政权并非否定身体，而是首先承认身体是“性的身体”，并以其繁殖能力来判断优劣。这样一来，性机制就成为调节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机制。基列共和国权力的运行和实施似乎完全体现在对终极目的的追求上，即对性的控制和对优生的追求上。在授精仪式上，使女和司令官的性交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我不说做爱，因为那不是他正在做的。说性交也不合适，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两人参与，而现在却只是一个人的事。就连强奸也无法涵盖之：这里进行的所有这一切无不是我自愿签约同意从事的”（94）。高宣扬论述了福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指出基督教在性道德方面特别强调“一切性行为只能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生产”，而一切“为了寻求肉体快感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和堕落的诱因”（932）。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对性欲和性爱的压抑正是建立在对《圣经》教义的极端理解之上，这样神权社会的一整套性技术就肩负起规训身体和调节人口的双重政治使命，并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在肉体 and 人口的问题上，性成为权力网络的核心、技术程序的主线；法律成为“约束型经验的禁忌力量”，人们“不再以身体获得快感的质量，而是以强化对

它的压抑来进行自我肯定”（黄华 98）。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极权社会的基列共和国为什么会性交往有着那么繁复严苛的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使女的故事》中，生命政治在宰制个人方面创造了一系列极其细腻而灵活的策略和技术，把个人的生命活动纳入整个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运作层面。生命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蓝本”的创造性论述，使“各种各样的性论述都显示科学理性的特征”（高宣扬 921）。小说中科技是支撑生命权力社会运转的基础，基列共和国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核试验的同时也对人体实施严格的医学监控和监管，在优生学上有着详细而周密的计划。比如，使女们每日饮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食物的滋味无关紧要，但必须是“营养极好的食物”；使女们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不喝咖啡和茶”，“滴酒不沾”（66）。性道德和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优生政治密不可分（178），甚至可以说，性道德就是法律和政治。当局宣布所有以前实施过流产手术的人都是对人类的“暴行”（32），甚至利用告密者从医院的医学报告和记录中档案中搜寻名单，对那些犯下“暴行”的人执行死刑。这很好地阐释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和“解剖政治”的结合。只有这样，权力机构才能够通过对个人控制达到对社会整体的控制和协调。因此，小说中的生命政治就是关于掌控个人、人口全体和实行生命权力的权力技术。

当“生命权力”延伸到人口控制领域时，就形成了福柯所说的“生的权力和死的权力”（*History* 135）。自古典时代以来，统治者对于“生和死的权力是不对称的，统治者行使自己的生死权力方式只能是处死对象或者不处死对象，他只有在见证死的过程中才能发挥生的权力”（136）。而“生命权力”带来了一个新的转变，使得统治者能够把古老的象征最高权力的处死权扩大并延伸为“对身体的管制和对生命的精确控制”（140）。在《使女的故事》中，神权社会的权力形式从决定死亡演变成为决定生存，所有人都被按照其身体特征进行了归类，以不同的分类要求加以管理。婴儿在出生后随即要通过鉴定，如果是“非婴儿”则被“立即在某个地方处理掉”（113），只有符合条件的“婴儿”才能够获得生的权力。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出生率，而且对性交和生产过程加以严格控制，在专门的空间中进行，司令官只不过是“在行使义务”而已（95），“妻子”则发挥监管和协助作用。“生命权力”的贯彻可谓无孔不入，以至于渗透到人们最隐私的生活领域。因此，奥夫弗雷德意识到“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包括过程和结果”（94）。任何未经授权的科学家和医生均不得干预妇女的生产。奥夫弗雷德看到围墙上的悬尸，因为他们曾经“利用吸宫术扼杀人类胚胎”而被视为“战争罪犯”处死示众（32-33）。

小说中的这种对人口控制的“生命权力”演化成了极权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福柯在《必须捍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指出，生命政治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权力，它“拥有这样的权力：让人死并让人生”（241）。通过新技术手段，国家的“主权权力就和生物权力结合起来”（Genel 47）。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生的权力”不仅甚至具备了法律权威，并和神权合二为一，上升到了“司法——话语”的性质（Foucault, *History* 82）。而在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和《洪灾之年》中，这种生物权力甚至变成了优生学政治，被统治阶层利用，通过基因工程改变人口的构造和组成。“秧鸡人”就是秧鸡利用克隆技术制造出来的用于取代具有各种生物缺陷的传统人类的新生“人类”。

生命政治不仅控制身体的繁殖功能，也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影响。在《规训与

惩罚》中,福柯提出了关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理论。他指出,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运行就是把人口“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Discipline 218)。在《使女的故事》中,极权主义者利用权力手段构建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口被按照功能和地位分为不同等级,分别属于金字塔等级的不同阶层。小说中男女两性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女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厨房、生育室、蔬菜店等,从事体力劳动和家庭服务;男人则主要从事科学生产等脑力劳动及社会监管工作。在种族划分上,白人、黑人都被称为“含之子”,犹太人则被称为“雅各之子”,他们是统治基列共和国的基要派组织的成员。人们的角色、地位、功能也被严格划分。按照社会地位和繁殖能力,女人又分为仆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荡妇等。肤色也是等级制度的重要成分,例如,相较其他肤色的女人,白人妇女拥有繁殖权力,因而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他女人处于社会边缘阶层,如没有生育能力的“非女人”、寡妇、同性恋者、尼姑或女权主义者,她们常常被输送到“殖民地”进行核废料清理工作。耶洗别^①被实施了绝育手术,在嬷嬷的管控下充当妓女或艺妓,专门为司令官提供服务。一旦她们不再有用,也会遭受和“非女人”同样的命运。需要强调的是,基列共和国也将男人们分为不同等级,如同性恋男子被宣布为“性别叛徒”,遭受严厉的惩罚。可见神权政治对人口的管理是严格地建立在性能力和繁殖能力基础之上的身体的控制,是对生命政治的滴水不漏的掌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人们相互猜忌,相互监视,构成整个社会等级的基础。小说中丽迪亚告诉使女们,她们“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学会控制”他人,因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144)。无疑,通过《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让我们认识到,权力作为社会运作的方式和基础渗透到了每个角落,任何人都不能逃离权力关系的网络。

综上所述,《使女的故事》是一篇关于身体政治的小说,在这篇被称为“反乌托邦”的小说中,阿特伍德运用文学的想象建构了一个在政治权力运作下的黯淡的未来社会图景。权力关系成为人的本质关系,身体被理解为书写的身体,是文化和社会的构建品。政治权力不仅体现在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上,还通过对监视体系的创造性应用和改造,扩大到服装管理、身体行为规则等领域。权力甚至成为生命政治的工具,应用于对人口的技术管理和分类权力等范围。阿特伍德对权力的这种深刻揭示充分说明了作者作为一名严肃作家对社会问题进行的深刻反思,揭示了政治对身体、政治对现实生活的渗透。□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twood, Margaret. *The Handmaid's Tale*. Toronto: McClelland, 1986.
- *Lady Oracle*. Toronto: McClelland, 1977.
- Baudrillard, Jean.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Sage, 1998.
- Dallery, Arleen B.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the) Body: *Écriture Féminine*.”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Ed. Allison M. Jagger and Susan Bordo.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89.
- Davies, Madeleine. “Margaret Atwood’s Female Bodie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Ed.

① 圣经中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以残忍、无耻、放荡著称。

- Coral Ann Howells. Cambridge: CUP, 2006. 58-71.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9.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 “The Meshes of Power.”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Ed. Jeremy W. Crampton and Stuart Elden. Aldershot: Ashgate, 2007. 153-62.
-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London: Penguin, 1984. 76-100.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Ed.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 Genel, Katia. “The Question of Biopower: Foucault and Agamben.” *Rethinking Marxism*. Trans. Craig Carson. 18.1 (January 2006): 44-62.
- Kuhn, Cynthia G. *Self-Fashioning in Margaret Atwood's Fiction: Dress,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5.
- Silverman, Kaja. *The Threshold of the Visibl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5.
- Svedsen, Lars. *Fashion: A Philosophy*. Trans. John Irons. London: Reaktion, 2006.
-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元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Foucault, Michel. *Punish and Discipline*.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1999.]
- 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Gao, Xuanyang.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Shanghai: Tongji UP, 2004.]
- 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Huang, Hua. *Power, Body, and Self: Foucault and Feminism in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05.]